

总 论

“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与 面向 21 世纪的党校教学改革

——中央党校 2001 年春季学期教学引论

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研究员 郑必坚

中央党校 2001 年春季学期的教学工作，现在由我来作引论，就是对本学期的教学全过程，从总体上作个说明。

题目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与面向 21 世纪的党校教学改革”。

一、面向 21 世纪的党校教学改革，一定要以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论述作为新的 思想武装和重要指导思想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之所以在全党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我体会原因就在于，它以高度精炼的表述，集中论了党，论了党的先进性，这样就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 21 世纪，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正如中央关于党校工作的决定所指出的，这一重要论述，是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面向新世纪党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那么，就中央党校来说，就我们党校所承担的在新世纪通过轮训、培训来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尤其是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庄严任务来说，怎样才能很好地坚持和体现“三个代表”的要求呢？

我认为，这里有两点特别重要：

第一点，首先和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把握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这里我要特别引用江泽民同志去年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说的一段话。他这样说：“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

眼点就在这里。”同志们看，江泽民同志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于一定要把对于时代发展、形势变化和世界进步潮流的把握，同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保持先进性和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密不可分地联系起来。一个叫牢牢把握时代精神，一个叫不断巩固执政地位，中心是保持先进性，这才叫“立于不败之地”。我体会，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实质所在。

第二点，就是要努力把握中央对于干部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这几年，中央一再强调要努力建设好一支不仅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而且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治军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再具体一些讲，从思想上政治上讲，什么叫“高素质”？去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了党的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四方面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就是：一要有坚强的党性，二要有宽广的视野，三要有务实的战略思维能力，四是归根到底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显然，这是根据 21 世纪党的事业发展的宏观要求提出来的，也正是“三个代表”思想在干部教育问题上的集中体现。

以上两点，就给我们党校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根本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校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布局”是：“紧紧围绕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心，建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充分适应世界大转折和中国新发展要求的，主要包含‘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党性修养’这几个方面内容的教育课程”。我体会，中央决定所规定的党校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布局，正是体现以上两点精神的，是一个能够有利于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大家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时代精神和执政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大家在自己的全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自觉性和先进性的，党校教学的良好框架。

下面我就分别从理论、战略和党性这样三个方面的要求，来作一点相应的说明。

二、先讲“理论基础”——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把握教学改革，就要下功夫面对邓小平指出的“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深层次问题，这是“理论基础”课程的一个根本性课题，也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世界观和党性建设的一个根本性课题

这个课题，是邓小平 1989 年强调指出的。当时他这样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

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观点极为重要，它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世界的变化，同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而且我体会，这是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反复强调指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两者实质上就是一回事，都是属于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理论问题”。

与此同时，我认为还可以说，后者（即“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又是前者（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的深化展开。无论是从深度方面还是广度方面，从历史方面还是理论方面，要求都进一步提高了。

因此我认为，这是邓小平重新提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世界观和党性建设的一个根本性课题。毫无疑问，这也应当成为我们中央党校从理论高度上把握教学改革，建设“理论基础”课程，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根本性课题。

那么，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这个根本性课题呢？邓小平在我们前面引用的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就明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他这样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很清楚了，在这个“如何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性课题面前任何以为历史条件变化了就可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以为光靠老祖宗的本本，靠经院式学习的办法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个根本性课题，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已经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在新的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一定要在实践的进程中，从邓小平理论所达到的新境界出发，从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二十多年伟大实践所达到的新觉醒出发，并且从对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世界历史变化和 21 世纪可见前景的科学估量出发，这样来重新领会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伟大科学成果，这样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更加坚实地建设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和世界观。

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里我不打算全面论述这个问题，而只想稍为展开地讨论一下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问题。这是因为，讲世界发生大转折，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经济是基础嘛！我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展进程和历史曲折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现象。我同时认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的产生、发展和所走过的战略道路，是同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有着深刻内在联系的。

首先请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是怎样观察人类历史上从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这一百几十年间，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或者说第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吧。他们在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工具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的概括，何等鲜明、尖锐、透彻！完全可以说，这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及其带来诸矛盾发展，所作的郑重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的世界眼光，由此而来。

还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此相关。作为以蒸汽机的使用为代表的，人类社会在 18 到 19 世纪生产力大飞跃、科学技术大飞跃、经济社会化大飞跃总结果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及民族、国家间多方面矛盾的激化，其在人类思想史上引发的最重大回应之一，即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即是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伟大号召的《共产党宣言》。

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革命。这个科学世界观是不朽的，至今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战略道路，则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条战略道路。

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经济全球化进入第二轮，在以电力、内燃机、化工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新的大飞跃发展基础上，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产生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但是资本帝国主义矛盾发展的实际结果，是在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过程中走向反面——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接连

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大血战，还谈得到什么经济全球化？！所以，第二轮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中断和断裂。结果是：战争引起革命。

这也是形势逼人啊！

由此而“逼”出了列宁、列宁主义、俄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又“逼”出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人民大革命，中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此还“逼”出了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就是列宁提出的。

列宁、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而他们所构想、所实践并取得伟大成功的战略道路，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完全不同。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抓住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俄国）甚至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用革命手段主要是革命战争夺取政权，并从而把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都同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之中断，之逆转，之断裂，直接相关。

应当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二条战略道路。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也是应运而生啊！

当然，同时也有一批党经不起这样的历史性考验，垮掉了。第二国际各党即是如此。他们不能对这第二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科学的分析，他们的应对战略更是完全错误的，结果是整个第二国际的破产。

二次大战以后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信息革命开始，特别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重新起来，这就是新一轮即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当然，二战过后就已经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新的工业革命。但这时信息革命还没有真正起来，可以看作是信息革命的准备阶段。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中心，形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才可以说是信息革命的开始，并由此出现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达到过的，通过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交通、通讯和国际金融运转的超高速化，而使国际经济联系愈益紧密起来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

毋庸讳言，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仍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或者说得完全一点，来自同苏联、中国、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存，而在科技、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新生产力。

这时发人深省的，是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动。首先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

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也有种种曲折，表现了它的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根本解决；但是总的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 30 年代中后期汲取资本主义大危机教训和吸取苏联社会主义前期计划经济的经验开始，到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多方面的改革调整，是做得很认真很内行，并且得到了实际成效的。从国内的改革调整，延伸到创建和运用一整套适应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组织，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生产力、经济社会化和世界市场，得到长足发展。

其次一个，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差不多同样一大段时间里固步自封起来，停滞在“计划经济”模式上，而且陷入同美国争霸和进行军备竞赛的误区，而无视或者拒绝社会主义改革。如果说“经互会”也是一种国家间经济合作，但那实质上仍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封闭半封闭模式。经济相形见绌，而党呢，——苏共和东欧诸党却又从长期停滞僵化（一个极端）跳到自由化（另一个极端），不可救药！如同第二国际各党经不起历史变动的考验那样，苏东一大片社会主义江山不战而亡。

第三个，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以及东欧那一大批党完全不同，我们党经过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建国三十年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在党和毛泽东为社会主义所作可贵探索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同时也在“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挫折的历史教训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同新的历史大变动结合起来了。我们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重新思考中国问题，重新思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自己起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并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在改革开放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开创出一条全新的战略道路。二十年间，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两步，实现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新的大飞跃。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所开创的战略道路，可真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和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提出过、更从未实践过的战略道路！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恰是在这一点上，突出地鲜明地表现了邓小平理论和战略的历史独创性。

大家看，二十多年来，我们党的一切巨大成功和胜利，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由此而来的。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我们今天种种困惑，种种困难，种种消极现象，难道不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吗？

中国共产党的重新思考，正如邓小平所说，是形势所迫——“迫使”。我们自己的严重挫折，加上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逼”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可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还是应运而兴啊！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二十年，恰恰就是第三轮经济全球化浪潮起来的二十年。于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崛起，就成为第三轮经济全球化中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现象。

在这样新的历史大转折中，在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历史时期，“三个代表”重要论述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的一种新的觉醒。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什么样的新考验呢？简而言之，三大考验：第一，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如何应对，能否在同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条件下，在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妄图称霸全球和诸多国际复杂矛盾条件下，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实现祖国统一。第二，能否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信息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胜利地担当起这样两个层次的现代化建设双重历史使命。第三，党本身能否在进入整体性的新老交替的新条件下，在国际国内新环境中，保持先进性和不断巩固执政地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曾经有个比喻：中国历史上三次“诸子百家”。第一次“诸子百家”，发生在大约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即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头一回严重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第二次“诸子百家”是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于是又一次严重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你看从林则徐起，到魏源、龚自珍，到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左宗棠，再到康有为、梁启超，一直到孙中山推翻帝制，这还不是“诸子百家”？！孙中山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最后解决问题和作出科学结论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么第三次“诸子百家”呢？就是今天，就是从 20 世纪后期直到 21 世纪中期，即直到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一大段历史新时期。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场世界范围的大争论不可避免。这难道不是又一次“诸子百家”，而且是范围空前之大的“诸子百家”吗？我们坚信，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战略一定能够引导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我们同时清醒估计到，要真正最后解决问题，那就如邓小平所指出，还要等到中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件事，我认为将决定全人类的命运！所以，可以说，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第三次“诸子百家”，情势最为复杂，规模最为广阔，意义也最为重大。所以，考验的严峻性由此而来，考验的重大意义也由此而来。

面对严峻的历史性考验，我们需要充分的精神准备。要有一个主心骨。你看苏联的垮台，源于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长期僵化，另一个极端是搞资产阶级自

由化。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搞教条主义，没有前途；照抄西方的本本，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不希望苏联垮台，但它要垮台，你有什么办法？它垮了，我们照样前进，而且前进得更好！这就如同当年第二国际那些大党、大人物垮台一样，虽然名声很大，有什么了不起？！这里决定的一条，就是有没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

再看一看十五大以来这两年多时间，真可以说是形势变化多端，麻烦不断。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突发事件，牵扯了我们党不少精力，但是也积累了一条极重要的经验。这就是：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繁重，越是斗争尖锐，我们越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定不移地按照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来把握大局。不然的话，一有风吹草动，就动动摇摇，甚至怀疑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对形势的基本科学判断，那还能办成什么大事？那就只能是一事无成！

总之，《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这一百五十多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共产主义者，一代又一代，应运而生，艰难曲折，但是总的说来没有白干！

由此悟出一条大道理：我们的伟大理想、信念、世界观和党性，是能够随着历史变化而前进，应乎天理，顺乎人情，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灭亡”，没有那回事！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看问题，这样来学习，我们就一定能够提起更浓厚的理论兴趣，掌握应有的历史高度和时代精神，并且一定能够如邓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力求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完整的科学世界观，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党性，来把握，来发展，而且一代一代传下去！

附带说一下，我们在党校的理论学习，还是要坚持读原著为主、自学为主的方法。至于我们组织编写的“三基本”教材，现在发给大家的是“试用本第四稿”，希望听到大家的指教，再作修改，拟于年内公开出版。

三、再讲“战略思维”——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把握教学改革，就要下功夫围绕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和居安思危的要求来开展战略研究，这是“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课程的中心环节

既然我们的教学改革是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那么我们的学习就不应是

经院式的，而应是紧密结合实际特别是当前世界发展的进步潮流和中国改革开放崭新实际的，就理所当然地要把从战略高度思考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一个极重要方面提到突出地位上来。这就是：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把理论学习同正确认识、掌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相结合，同认真研究分析我们面临的新形势以及为开创改革和建设新局面所必须采取的重大战略部署相结合，还要同对 21 世纪世界范围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相结合。

当前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国际国内重大现实和战略问题很多。这里我不可能也不需要论列这些问题本身，而只是想着重从学习理论同加强战略问题研究、培养战略思维能力的关系上，讲几点意见。

一是关于把握大局。同志们都知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在这部著作当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战略问题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其中第一层概念是带总的，就是明确规定了“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你看这条基本规定，一下子就把问题的范围明确界定了。第二层概念，是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明确指明，“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这样又把全局和局部这两个不同范围的认识，辩证地连接到一起了。第三层概念，是从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的另一侧面，指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并且由此进一步提出要注意区分两类局部——“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和“不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第四层概念，是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心上强调指出：“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要求“指挥全局的人”以至“任何一级的首长”都一定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第五层概念是，向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郑重地提出了学习和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强调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想才能懂得”，从而才能“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仅仅从以上这几层很不完全的概述，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确实是从根本上，也就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回答了，究竟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具备的“战略头脑”，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怎样学习和掌握这样的“战略头脑”。1936 年到现在这六十几年当中，毛泽东的论述真正是深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心，以至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所特有的思想方式和语言

表达方式。

那么邓小平理论在战略思维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在邓小平理论当中，一个很突出很鲜明的特点，就是邓小平把注意全局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地运用和发展起来了。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就要完成的时候，邓小平这样说过：“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在这里都不是从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来讲的。”我体会，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是他作为作者，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一个集中评价，而且是他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条毕生经验之谈，是他本人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最鲜明特点的一个重要概括。

请同志们回想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制订和坚持，各条战线（包括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关系的把握，发展、改革、稳定的结合，以及国际与国内大局的结合，等等方面，都离不开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不动摇地（“扭住不放”）贯彻落实大局观念这一条。

而且，大局角度也就是政治角度。邓小平这样说过：“经济问题我是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他在这里所说的“政治角度”，同我们前面引述他所说的从“大局”而不是从“小的角度”，显然是一回事。讲政治就要讲大局，讲大局才能讲政治。

所以，把握大局，正是邓小平理论在战略思想方面一个很突出很鲜明的特点。

二是要把大局观念同抓住机遇二者紧密结合，这是邓小平理论在战略思想方面的又一个很突出很鲜明的特点。通观《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尤其是1990年到1992年这两年多、不到三年时间里，也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更为明显。这一段时间总共收进八篇，其中七篇都直接讲到机遇，最后一篇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尤其突出。真正是语重心长啊！

我这里仅举三条。一条是请先看1990年3月。邓小平这样说：对国际形势，“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联系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外的实际思想状况，这些真正是切中要害！邓小平就是这样把握大局，这样抓住机遇，这样从战略高度使把握大局同抓住机遇紧紧结合到一起。

第二条是请再看1991年8月。邓小平在这里突出讲了两个“难得”：一个是“人才难得”，还有一个就是“机会难得”。他在这里讲到一个极关重要的战略观念：“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就是机遇。”“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第三条就是 1992 年一二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抓住机遇问题讲得更加系统和深刻，而且更为展开了。他从历史讲起，他说不搞争论，“不争论就是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不争论也是同抓住机遇联系在一起的，这本身就是一条重要的战略思想。他又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那么，经济怎么发展，怎么抓住机会？他接着就讲了上台阶问题，上台阶就是抓住机遇。他说：“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还由此提炼出一条重大原理：“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实在鲜明得很，邓小平从大局观察，到各项具体方针政策的把握，都同抓住时机这个战略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是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增强信心，这也是邓小平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反复强调的一个重大战略观念。他从勇于开拓的要求出发，强调“不要怕冒风险”，“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时又语重心长地强调提出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的问题，强调提出了“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他这样说：“我们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同志们都很清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反复强调了这个重大战略观点，直到前不久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就是要忧党忧国，同时又一定要有一种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心。对党要有信心，对国家和人民要有信心。这种信心，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而且是因为我们居安思危，清醒谨慎。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有了邓小平理论这一主心骨。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风云变幻，不管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我们都要有江泽民同志倡导的气概：“任它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

总之，八个大字：“全局、机遇、忧患、信心”。这就表明，我们提出对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实质上是同我们理论武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们的世界眼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同我们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归根到底，这也是同增强党性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请试想一下，如果在复杂形势面前看不清全局，看不出各种问题的隐患，看不到应当抓住的机遇并有所作为 而是失去清醒 或者萎靡不振 悲观失望 甚至迷失方向，那还谈得到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什么坚强党性啊？

四、再讲“党性修养”——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把握教学改革，就要下功夫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把党的先进性作为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这是“党性修养”课程的主导线索，也是当前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深入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我在前面已经明确讲到，这里需要再一次地加以强调，就是增强党性的要求，应当贯穿我们中央党校教学的全过程。我认为这绝非一句空话，也不是套话，而是由我们主体课程的思想内涵和学习要求所决定的。从“理论基础”到“世界眼光”、到“战略思维”这一系列课程，归根结底，贯穿始终的一条，应当就是通过学习，不仅要增加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而且要更好地确立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必须确立的科学的理想、信念、世界观，增强我们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坚强党性。

与此同时，我们又专门设置了“党性修养”这样一个教学阶段。这个阶段，包括专门进行党史、党建课程的教学，专门组织学员同志们进行党性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典型的案例分析，以及在学制较长的班次专门进行个人的党性分析。

此外，为了充实和提高党建课的质量水平，经过向锦涛同志报告，也向庆红同志报告，在他们的赞同和支持下，从2000年2月份开始，中央党校组织全国二十多所省市党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建调研。5月份召开了调研工作汇报会。9月份召开了二十所党校参加的关于跨世纪党建问题调研成果交流会。今年春季我们又根据中央部署进一步开展了党建调研。相信这一系列调查工作，也会有利于我们党建课程质量水平的提高。

在作了以上有关“党性修养”教学要求和打算的简略说明之后，我想在这里着重提请同志们特别注意思考的一个带总的问题，就是江泽民同志在“三个代表”论述中，提出的面对21世纪，面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全球化大潮和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将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大思路。我认为，集中论了党的先进性的“三个代表”重要论述，就是我们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这是因为，所谓党的先进性，就是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而党只有坚持“三个代表”，并且从理论、路线、纲领、政策直到全部实践都能体现“三个代表”，才算是真正做到这一点。这当然也就是党的政治方向，同时也就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

试问如果离开了党的先进性，离开了集中体现这种先进性的党的政治方向，党

还能有什么生命力？党还能有什么战斗力？党还能有什么资格领导人民？党还能有什么资格执掌政权？——果真如此，那还谈得上什么党性要求啊？！

我们党之所以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或“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立足于“先进”，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党的理论、路线、纲领之所以是决定性的东西，原因也就在这里。

关于“三个代表”是党性要求的根本之点，还需要从以下这样几个问题，来进一步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阶级性。信息革命来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否失去了先进性？有一种说法，认为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是最先进的，而工人阶级则不是先进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新时期一开始，我们党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是中国工人阶级进步的总趋势，也是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条件下中国社会进步的总趋势。所以我们党没有采用西方那种“中产阶级”的概念，没有上那个洋当！

至于当前大批职工下岗，我们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怎么看呢？我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化甚至重大变化。某些不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逐步被淘汰，而那些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行业则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变动过程中，职工队伍的某些部分难以避免要遭到暂时困难、下岗转岗。但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阶级由此失去了先进性，更不是说“三个代表”与工人阶级不相干了，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恰恰相反，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所带来的先进取代落后的进程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和整体优势正在进一步提高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把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先进性，同旧体制下的“大锅饭”等等混为一谈，那只能是一种误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和经营管理者，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所以，“中国先进生产力”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中国工人阶级”也应是一个多层次的、内涵广阔的大概念。中国现代化建设肩负双重使命，即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进行信息化。因此，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这双重使命而进行的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使包含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提高的传统产业在内的中国先进生产力得到广大的发展，并使中国工人阶级本身经历深刻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结果，只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更加壮大和整体素质、整体优势的进一步提高，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纲领的现实性。我们党是共产党，党的最高

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全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全人类理想的最高体现，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同时我们又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今天，在 21 世纪，以至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为之奋斗的东西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还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就是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叫共产党，最高奋斗目标也是实现共产主义，但现实的奋斗目标则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在今天，21 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最高理想仍然是共产主义，但现实的纲领则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在现时代条件下真正做到“三个代表”，那就要横下一条心，在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就干一件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有一条极深刻的道理，就是正确处理最高理想、最高纲领与现实目标、现实纲领的区别与联系。

请看毛泽东这样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和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他又把党的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联系起来，尖锐指出：“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的、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再看党的十五大这样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这样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五大提出要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党的先进性的一个表现。我们党对自己先进性和纲领的现实性的理解和处理，是充满革命辩证精神的科学理解。这正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高明之处和伟大创造！

说到这里，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由此就可以摆脱种种有关党的先进性的简单化理解。除了上述那种把共产党理解为急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的想法和做法之外，还有一个把工人阶级政党理解为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成员才能入党的问题。老实说，这种理解，在党的历史上就是有过，实质上是照抄联共，以为既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那就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工人出身的成分为主体，搞城市工人暴动等等。但是中国革命的发展，1927 年以后被迫转为以农村为主要阵地，以农民为主力军，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要成分！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

设党的问题就提出来了。最先尖锐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他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中，一开头就指出，红军第四军“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毛泽东接着强调的，正是“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的教育”和对不正确思想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那么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思想来建党呢？最根本的，还是党的纲领，而且是包含最高纲领和现实纲领的这样两套纲领。这就叫做：思想建党，两套纲领。毛泽东就是以这样深刻的党建观念，从实际出发，把以农村为主要阵地和以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党的建设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表面上看来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伟大事业做成了。这也正是革命的辩证法。联系到今天和今后，面对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折和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认真领会和掌握这两个纲领和思想建党的成功历史经验，实在具有极关紧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第三个问题，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社会基础的广泛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是这个先进性本身就要求党同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也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即做到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党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那么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党为什么不能改成“全民党”呢？这是因为，第一，所谓“全民”，本身包含着众多方面的复杂的利益群体；第二，如果“全民”就是指的“全体人民”，那么这个众多的复杂的利益群体，既客观存在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眼前利益；第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作为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才具备必要的眼界和能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起来，同时又照顾到各种利益群体的眼前利益；第四，这个必要的眼界和能力，只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什么理论，才能给我们提供；第五，世界政治史的全部经验，包括苏共所谓“全民党”的破产，反复证明，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全民党。

至于说，党的名称叫“工人阶级先锋队”，农民怎么办？应当说，这是早已明白解决了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农民为主力军，农村为主要阵地，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我们党不仅并没有因此而改名，而且通过党的建设的第一个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今天和今后，我们无疑仍然要吸收农民及其他社会群众、社会阶层中一切先进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并且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成为新的伟大革命熔炉，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而又能够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坚持“三个代表”的，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第四个问题，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队伍的组织性。很明白，党既然把自己规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那就必然有其作为“部队”在组织方面的特定要求。这就是说，党的组织原则，是党性要求绝对不可缺少的又一方面，也是保证党